

# 阿莱西纳对政治宏观经济学的贡献<sup>\*</sup>

——汤森路透“引文桂冠”得主学术贡献评介系列

周学荣

**内容提要:**阿尔贝托·阿莱西纳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宏观经济学家,他在轮流选举执政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政治经济周期,种族多样性与经济绩效,不平等不公正与再分配政策的选择,家庭关系对个人行为的影响,文化与制度对政治经济的影响等领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方面均做出了重大贡献,本文拟对阿莱西纳上述的主要学术贡献进行归类梳理。

**关键词:**阿莱西纳 选举动机 种族多样性 政治宏观经济学

阿尔贝托·阿莱西纳(Alberto Alesina)是意大利裔著名政治宏观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1957年出生于意大利帕维亚;1981年获博科尼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85、1986年分别获哈佛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86—1988年曾在卡内基—梅伦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1988年起就职于哈佛大学,先后担任经济学助理教授,政治经济学副教授;1993年起担任哈佛大学经济学与政府管理学教授,曾于2003—2006年任哈佛大学经济学系主任;现任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N.罗普斯讲席教授;同时兼任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研究员。阿莱西纳是宏观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他主要利用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不同国家的数据,对政治商业周期、财政政策与预算赤字的政治经济学、再分配政策的政治经济因素、轮流执政的选举制度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家庭力量对人们经济行为的影响、文化与制度的相互关系等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鉴于阿莱西纳对宏观政治经济学的贡献,被汤森路透公司评为2010年度经济学领域“引文桂冠”得主,预测其未来可能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本文据此对阿莱西纳对政治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学术贡献做一梳理。

## 一、对选举、宏观经济政策和政治经济周期的研究

阿莱西纳(Alesina, 1987)在研究轮流执政对宏

观经济政策带来影响的问题时假设,不同政党在宏观经济政策问题上存在不同的偏好和目标,由于每个政党代表不同选民的利益,因此在经济政策的选择上会出现分歧。在这种情况下,政党被塑造成“具有不同政治目标”的政策制定者。各政党通过选民的投票选举获得制定政策的权力,而这种投票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同时,不同党派在掌权时会采取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这一观点在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得到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比如,在面对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问题上,如果两个政党持不同意见,他们的最优政策则会不同,而每个政党都希望借助自身的最优政策获得选民支持,因此两个政党会做出不同的政策承诺。如果两个政党目光短浅,产出将会出现波动。实证研究表明,如果各党派能够从长远来看,采取一种合作式的共同政策规则会对各党派获得选民支持都有利,则可以避免经济出现大幅波动(Alesina, 1988a)。因而在执政时面临着两个抉择:一是采取短期内最优化其选民支持者的政策,最优化其支持者的短期利益;二是沿用合作式政策,让选民支持者长期受益。假如各方政党承诺具有约束力,则两个政党均应约束自身遵循合作式的政策规则。即使在无法获得具有约束力的政党承诺的情况下,两个政党重复不断地相互影响和博弈积累的信誉力量也会提高自由裁量政策带来的成果。

<sup>\*</sup> 周学荣,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邮政编码:430062,电子邮箱:1615285303@qq.com。本文得到湖北大学创新团队科研业务费(13HDCX01 060—095168)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文责自负。

关于宏观经济政策政党博弈行为的研究阿莱西纳(Alesina, 1988b)重点关注的是政治经济学博弈模型的实证应用,决策者追求的目标决定了这些模型的构建。通常情况下,政治家有两个动机:一是完全出于“留任动机”,他们会认为赢得选举是唯一的目标,这种情况下,政治家有相同的目标函数,因为他们都寻求最大限度地提高支持率。二是如果他们“意识形态的动机”或对不同选区的福利有不同的看法,即他们在政策问题上有明确的党派意识或追求不同选区的经济利益。他们只有在任上才能执行所期望的政策,因此,赢得选举成为实施所需政策的一种手段。在一般情况下,两种动机可能并存,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政治家最大化目标函数的性质:纯粹的具有“留任动机”的政治家有不太明确的目标,而“党派政治家”有明确的不同目标。

阿莱西纳提出的两党具有不同目标函数的博弈模型指出,如果政党和选民间的互动是可重复博弈的,政治竞争的结果会带来完全或部分的政策衔接。但是这种合作并商定的政策,能否持续作为一个最优的子博弈均衡将取决于参数值,特别是两党的信誉、偏好的两极分化程度和两党相对受欢迎程度。在经济政策中,过度波动对于整个社会有相当大的危害,而政党的反复博弈可以减少经济政策的过度波动,起到平滑经济波动的作用。

这里所讨论的政治经济周期的理性模型主要沿着两个重要的维度进行研究:一是决策者动机的假设;二是理性的选民和经济主体的假设。这些模型已经得到几次实证检验的支持,主要体现在以下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中。

阿莱西纳和萨克斯在《1948—1984年美国的政治商业周期》(Alesina & Sachs, 1988)一文中,对美国存在的政治性商业周期及其带来的影响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所用的样本从杜鲁门总统第一任期到里根总统,涵盖了二战后的9个完整的行政部门。所建模型基于政党的“党派观点”,更看重理性和前瞻性的预期。模型假设:在没有选举时,经济会表现出政策中立性特点。因此,选举成了一个不确定的未来的重要来源,经济主体无法预期哪一方赢得选举。如果有关货币政策和通货膨胀的预期在选举前就形成了,两党都期望一次当选,他们会选择中立政策。如果不选择中立政策,在任期刚开始时,主张更为扩张政策的党通常看到的是产出扩张高于货币增长的趋势。相反,当一个不主张扩张政策的政党被选举出来时,通常看到的是经济衰退。在任期的后

半段时间里,由于没有选举压力,结果显示政策中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两个政党执政的后半任期应该做出相同的政策选择。但是数据显示,即使在后半任期,货币扩张的速度取决于现任的政党是哪一种类型;产出增长的系统性差异发生在任期的前半期内,而不是按照理论上认为的后半期;货币增长率在整个任期都会有系统性差异;新政策的实际效果在前半任期中更为强大。

政治竞争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通常被认为是经济波动的根源。阿莱西纳在《工业民主国家的政治商业周期》(Alesina, 1989)一文中,针对政治力量如何对通货膨胀水平、失业和经济增长水平产生影响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对几个工业经济国家过去20多年的数据进行统计,结果支持强调党派之间存在系统性差异的“党派理论”。不同政府所带来的真实经济结果的差异大多会暂时集中出现在上任的初期。因此保守党会在刚上任时采取经济低于平均增长水平、增加周期性失业和低通货膨胀的政策;而左翼政府在刚开始上任时采取相反的政策。在后半任期,即使在左翼政府的通货膨胀更高的情况下,真实的经济产出的差异会逐渐消失。实证结果显示,保守的政府一旦当选,首先对抗通胀,尤其是如果他们继承了高通胀率的话,这导致早期的衰退;一旦经济得到调整,经济复苏通常会发生在下一次选举前,且保守政府在通胀保持低水平的情况下不会反对选举前的经济复苏。比较好的例子是首任里根政府、首任瑞典保守派、首任撒切尔政府和科尔政府时期。另一方面,当左翼政府当选,他们对抗失业并在任内早期实现经济扩张。一旦通货膨胀跟上,他们允许增长率下降,通货膨胀这时被认为是经济的主要问题。特别好的例子是卡特总统(1976—1980)、密特朗总统(1981—1986)、德国社会民主党(1976—1980)和瑞典社会民主党(1983—1985)时期。可以明确的是,不管政府的意识形态取向如何,对于财政政策很少会看到在选举前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经济的稳定和政治的稳定高度相关。

阿莱西纳等(Alesina et al, 1992)曾以18个OECD经济体为样本对“政治商业周期”进行实证检验,通过面板回归分析结果显示:(1)选举年存在扩张性货币政策证据,即存在“政治货币周期”;(2)选举前存在“宽松”的财政政策迹象,即存在“政治预算周期”;(3)通货膨胀表现为选举后的一个跳跃式增长,主要是由于在选举前采取宽松的货币、财政政策和公开控制价格或间接税上涨的时机带来的。对此

他们认为,政治家在通常情况下都会在选举年试图避免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约束,偶尔采取公开扩张政策。通过对18个样本国的研究发现,大多数国家的货币和预算周期频繁发生,在几乎所有的样本国家中,周期在每一次选举中出现,且非常明显。只有两个国家,德国和新西兰例外。德国是具有独立央行的国家,因此选举操纵货币政策的预期非常小。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德国利用其良好的短期失业和通胀的权衡关系的能力较强。由于其稳定价格的坚定承诺,得到一个平坦的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人们会期望稍微操作一下货币政策可对结果产生很大的影响。新西兰的情况更让人信服,在最近的体制改革中,央行独立程度的显著增加可能已经采取了一些举措来限制选举操纵货币政策。总的来说,应支持用“理性”的方法来模拟政治经济周期。这是因为,假设选民幼稚不理性的话,政治家很容易操纵货币政策,那么在选举前的政策工具操控会很普遍并且容易被发觉。但是与预期的相反,研究结果非常明确指出,财政和货币政策周期发生很频繁(不是每一次选举都发生),且强度相当的稳健。他们进一步指出,政治家在什么时候会出现政策工具的机会主义操控问题值得研究,也许会在当政者不确定是否能连任需要采取额外措施推动选举时。相反,如果当政者处于稳定地位,不需要致力于任何连任努力时,政治周期可能就无法看到。

阿莱西纳和鲁比尼在《经合组织经济体的政治周期》(Alesina & Roubini, 1992)一文中,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动态增长、失业和通货膨胀是否系统性地受到选举时间和政府轮换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同样以18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经济体为样本,以30年为研究跨度,明确地测试了几个模型的政治周期的含义,包括“机会主义”模型、“党派”模型和“理性”模型。研究发现:(1)由于选举前的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通货膨胀往往会在选举后立即增加。然而,选举后通货膨胀增加的结果可能标志着选举前机会主义预算政策事件的存在。事实上,阿莱西纳等(Alesina et al, 1993)认为,预算赤字和货币增长往往在一些经合组织国家选举年增加。相对于试图提高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而言,在关键区选举前的“财政偏爱”非常有用并且容易实现。根据样本数据统计发现,这些机会主义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共存于党派周期里,即具有不同意识形态和选举动机的党派可能会在短期内采取选举的机会主义政策。(2)政府短期内在产出和就业

方面的分歧,以及从长期来看政府在通货膨胀率方面的分歧证据,正好与阿莱西纳(1987)提出的“理性党派理论”吻合,但同时也认为党派理论模型对产出和就业产生永久的影响是不可能的。(3)通货膨胀率与选举之间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即左翼政府在选举时会采取扩张经济政策,在继续执政约2年后会进行通胀调整,使经济恢复自然增长率。当右翼政府被选举产生时,他们会对抗通胀,导致经济衰退和增长缓慢;在其执政后期,经济会以其自然增长率增长并保持低的通货膨胀率。(4)从长期来看,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党派在产出增长和就业方面存在明显分歧。

在选举前,政客们会操纵经济政策以增加他们的竞选连任的机会吗?利用有利的经济条件下的选举被称为选举战略吗?前期文献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结论是:没有证据证明在选举前的经济活动(高增长,低失业率)会系统地激增。然而,阿莱西纳和鲁比尼(Alesina & Roubini, 1992)提供了一定的证据证明,在选举期间通货膨胀率在增加,或者说,政策工具在选举前被操纵,虽然它们不影响真实经济变量,但影响通货膨胀率。阿莱西纳等在《工业国家的选举商业周期》(Alesina et al, 1993)一文中进一步提供的证据与这一结论相一致。他们以18个工业民主国家在1960—1987年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寻找在选举时政策操纵的证据。研究目的在于,一是检测选举的内生时机问题;二是深入调查了选举前对货币和财政政策工具的操纵问题。研究表明,政治家机会主义行为的政策操纵不能被排除。但这些证据并不是压倒性的强大,也许是因为政客们在宏观经济政策操作上不能走得太远,因为他们害怕失去他们的名声。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财政政策是顺周期性的,阿莱西纳和塔贝里尼在《为什么财政政策经常顺周期?》(Alesina & Tabellini, 2008)一文中指出,这一政策失败是源于政治代理问题。顺周期性是选民寻求减少政治租金的路径之一。选民通常观察到经济状况,但却看不见腐败政府拨款的租金。当选民看到经济繁荣,那么更多的公共产品和低税收将会成为他们的最佳需求,这导致财政政策的顺周期性偏差,即财政政策的顺势循环。具体表现为,政府的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繁荣时上升,在萧条时下降;赤字在繁荣时增加,萧条时下降。而在OECD国家,正好相反,财政政策通常是反周期的。阿莱西纳和塔贝里尼(Alesina & Tabellini, 1990)

的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财政政策顺周期现象的解释是,理性选民将试图去抑制政府的腐败行为。当选民意识到财政收入增加时,就要求立即以减税或增加生产性政府支出或转移的形式来实现利益,否则,担心现有的额外资源将被租金“浪费”。面对这些周期性需求的选民,政府在经济好的时候不积累储备,相反却招致巨额债务。从选民的角度看,这是次优的短视政策,他们放弃了增加消费的机会,但至少可以避免给政府的腐败行为留下过多的租金。这种政治扭曲导致了过度的政府债务积累和财政政策的顺周期性。实证结果显示,一方面,在能够通过民主制度被选民追究腐败政府责任的国家,财政政策顺周期性越明显;另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财政政策的周期性,通常是由一个扭曲政策对繁荣的反应驱动的,而不是对经济衰退的反应驱动的。

总的来说,对经济政策的积极认识不能也不应忽视政治舞台。经济学家不能忽视政治制度和政治科学家不能忽视经济力量;两者之间的密切互动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

## 二、种族多样性对公共产品支出与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

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种族的多样性和冲突成为影响政治经济的一个因素。它可能带来政治的不稳定、不合理的经济政策设计和令人失望的经济绩效。阿莱西纳等(Alesina et al, 1999)以美国三级城市地区(cities, metropolitan areas, urban counties)数据组为考查对象,发现种族分裂影响地方公共产品,主要体现在公共产品的支出结构、支出总额和预算平衡上。他们构建了在一个城市中,不同种族对公共产品的数量和类型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偏好的模型。结果显示,即使在控制其他社会经济和人口决定因素时,在生产性公共产品(教育、道路、下水道和城市垃圾清运等)的支出份额上,城市地区内种族分裂和冲突程度越高,生产性公共产品的支出份额就越少。因此,种族分裂和冲突是地方公共财政政策的重要决定因素。如同当个人有不同的偏好时,他们不会为公共项目投较多的资源一样,在多种族地区的城市中,政客们身后都有各自的种族群体,在公共产品的支出比例上通常很低。基于种族的利益集团更看重公共物品给他们所在族群带来的利益和好处,而很少考虑其他的族群。导致种族利益集团产生这种想法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不同的种族在生产哪一类的公共产品的税收收入上有不同的偏好;二是

对于一个给定的公共物品,如果其他族群共用的话,就会降低这个族群的效用水平。因此,当一个种族的税收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是用来提供公共产品并与其他种族共享时,基于种族利益的政策制定者通常会选择较低的公共产品支出政策。

阿莱西纳等(1999)研究表明,不同种族对核心公共产品的不同偏好与消费支出之间的反向关系是显著的。同时种族分裂的问题与种族隔离问题相关,因为种族分裂的司法管辖区是隔离的。因此种族分裂对公共产品的负面影响与种族隔离有关,如果种族分裂和隔离导致公共产品(尤其是教育)供应不足,种族隔离的弱势族群可能更落后,造成恶性循环。例如,一条位于黑人贫民区的地铁,历经几年仍然不能完成,增加了他们找工作或上班的成本。对此,他们认为,虽然分离的种族可能有一些短期的好处,但可能会有毁灭性的长期成本。

在不同的国家什么使经济增长获得成功?什么因素影响政策和制度的质量?这两个问题对经济学家来说一直很有吸引力,但也是两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以前学者分别从纯经济的、种族的、地理的、法律的、政策的、文化的、宗教的和历史的角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阿莱西纳等(Alesina et al, 2003)以190个国家为样本,采用不同的研究视角就种族的基础结构、语言和宗教分裂对制度与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部分肯定,同时也部分地推翻了前人研究的结论,在两个方面做出了贡献:一是提供了更大范围的国家样本数量的测量,提出了影响分裂的一组新的变量,努力解决了用一致的标准进行国家分类的问题;二是用这些新的变量,重新审视关于增长的决定因素问题和政策、制度质量的决定因素问题。研究结果发现,种族和语言隔离比宗教隔离更可能成为经济成功和产出增长(GDP的增长)、福利政策质量措施(识字率、婴儿死亡率)和制度质量(由腐败的程度和政治自由来衡量)的决定因素。

关于种族多样性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表现在正反两个方面。阿莱西纳和费拉拉(Alberto & Ferrara, 2005)以不同规模和组织结构的社区(如国家、发达国家的城市、发展中国家的乡村等)为样本,探讨了种族“多样性”的优缺点。在调查和评估大量文献基础上,深入研究了种族多样性对经济政策和结果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他们同时考虑了政治司法管辖区内的内生形成问题,特别是对种族内部认同感和种族多样性的形成问题。他们认为,不同程度的分裂

对政府质量、经济政策、增长、动荡、犯罪、民间战争等有不同的影响。一方面,种族多样性的潜在成本非常高,偏见、种族主义和歧视的冲突往往导致人们认为社会是“恶”的,而采取适得其反的政策,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可能导致政治动荡甚至内战。另一方面,一个多样化的种族组合也有可能带来各种各样的能力、经验和文化,产生创新和创造力。在生产过程中,不同种族的个人技能可以互补,这意味着更多的多样性可转化为生产力的提高。“多样性”是好还是坏?有大量的证据可以证明,分散的社会往往更倾向于对穷人进行政策管理,比种族单一的同质的社会带来更多的政治经济挑战;个人效用取决于公共利益共享消费,因为不同的种族对公共利益的类型提供有不同的偏好,因此增加多样性可能降低公共消费的效用。但研究结果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美国种族多样性与社区居民收入水平之间存在积极的相互作用,这表明种族多样性可以是有益的。一种解释是,在发达经济体中,只有当生产过程是充分多样化时,技能互补的生产力效益才能够得以实现。另一个补充的解释是,随着制度的功能不断完善,他们能够更好地应对冲突元素固有的多样性或缓和其负面影响。

种族、语言和宗教冲突往往会对政策和经济带来影响。阿莱西纳和茹拉夫斯卡亚(Alesina & Zhuravskaya, 2008)指出,尽管一系列呈负相关性的政策变量,如民族语言隔离、差的政府质量等得到了揭示,但是,什么办法让各国多少能够处理多样性甚至从其中获得收益问题仍然没有满意的答案。由于缺乏数据,现有的跨国界的文献很少考虑种族隔离问题。而他们在这方面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包括:(1)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按种族、宗教和语言分类的数据汇总,其中包含 97 个种族,92 种语言,78 种宗教族群,这些数据基于地方层面,涉及 90 多个国家,可以对以前各种各样的涉及种族、语言和宗教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也可以测量任何一个国家内不同种族、宗教和语言隔离情况。(2)指出一个国家的种族隔离政策应该建立在国内和周边国家的族群构成基础上。(3)发现种族和语言隔离与政府的质量呈高度的因果负相关。通过最小二乘法(OLS)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回归分析发现,种族和语言隔离程度越高的国家,政府质量就越低,二者间的负相关关系十分显著。相比之下,种族和语言隔离对政府质量的影响在民主国家更强烈,同时宗教隔离与政府质量无相关性。他们对该结论的解

释是,分离的族群不能形成共同的目标和见解,而这些目标和见解有利于更好地制定政策。同时,地理位置集中的族群更可能促使形成基于种族特点和地理基础上的次优政策,因为少数民族投票对政治家的选举更可能基于地理上的限制和种族特征,而不是基于政治家的质量,因而最终影响到政府的质量。在某些情况下,分裂威胁给中央政府带来压力,这可能要花费额外的资源镇压或平息,而非生产公共产品与地方治理(Alesina & Spolaore, 2003),从而使资源得不到更有效的利用(即从更多的生产性使用中消耗资源)而影响到经济绩效。

### 三、对不平等、不公正与再分配问题的研究

在不平等、不公正给政治经济带来影响的研究方面,阿莱西纳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当个体受到不平等待遇时,通常幸福感会降低,而社会流动性程度的高低会影响人们的不平等感;腐败是导致不公平不公正的一个根源,大政府提高了腐败的可能性;生产活动产生的不平等通常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而寻租产生的不平等被认为是不公正的;人们对公平的信仰建立在个人对不同水平的收入和财富的“配”与“不配”的个人理解上;人们对公平的认识和信仰影响再分配政策的选择等等。这些结论和观点让人们在不平等和不公正有了重新的认识和思考。

阿莱西纳等(Alesina et al, 2004)提出在控制个人收入情况下,不平等是否和为什么会给个人效用带来负面影响问题。他们根据对“幸福”的回答来测量该效用。通过统计 123668 份调查问卷,希望找出社会上不平等程度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即使控制个人所得税、大量的个人特征、年代和地区等变量,当个体受不平等程度高时,会觉得越不幸福。这一影响在欧洲比在美国更明显。另外,还发现在欧洲的富人和右翼基本上不受不平等的影响,而穷人和那些在政治上不平等的人感到不幸福;而在美国,穷人和左翼的幸福不受不平等的影响,相反,在美国富人反而受不平等困扰。各大洲相比后发现,左翼在欧洲比在美国更受到不平等的伤害。在收入群体方面,美国富人和欧洲富人在不平等影响他们的幸福程度方面没有显著差异,然而,欧洲的穷人与美国穷人相比,更受到不平等的影响。

阿莱西纳等(2004)认为这些结果是由于对社会流动性程度的不同看法带来的。在美国,人们认为

他们的社会是流动性的,他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容易流动的社会中,相信个人的努力可以让他们的收入水平上下变动,流动性的机会是(或被认为是)高于欧洲的。穷人认为他们可以有会上升为富人,富人也有可能降格为穷人,所以美国的穷人似乎完全不受不平等的影响。在欧洲,一个阶层固化的社会让穷人厌恶不平等是因为他们感觉无法自由流动,并且欧洲富人比穷人更讨厌不平等,这一点与美国相同。因此,在欧洲,存在着希望能够自由流动的普遍信念与实际流动性的有效措施不足之间的矛盾问题。另外,欧洲社会被“困扰”的不平等问题会扼杀创造力并且创造了一个穷人对“福利依赖”的恶性循环。

在过去几十年里,由腐败带来的不公平、不公正以及对政治经济产生的影响问题,也一直是学者们感兴趣的话题。对此,阿莱西纳和安杰利托斯(Alesina & Angeletos, 2005a)指出:“大政府(大规模政府)提高了腐败的可能性;更多的腐败可能会依次提高支持再分配政策的意愿,以打算纠正腐败所产生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在这种情况下,引入政府的规模、腐败的程度和不平等的持久性等因素分析,会存在多个稳定状态。与此同时,他们认为市场经济通常会带来收入和财富上的很大差异。穷人总是会要求再分配政策,渐进式的所得税,广泛的监管,大型公共项目等。但往往这些旨在纠正不公平和不公正影响的措施,却创造更多的腐败和寻租的机会。如税收漏洞,在公共项目的分配腐败,或受利益集团游说影响进行更大更好的基础建设。更有甚者,那些得益于腐败的人可能更倾向于更高的税收和更多的监管,不是为了穷人,而是因为大政府增加他们可以提取的租金。

以上这些见解的三个关键思想是:(1)大政府增加了个人腐败收益、利益集团利益和其他形式的寻租;(2)这些收益在人口分布上是不平衡的;(3)社会认为来源于腐败和寻租的不平等比生产性努力和市场竞争的不平等更不公正。对此,阿莱西纳和安杰利托斯(2005a)构建了一个简单的动态模型。首先,模型指出政府控制的资源越多,或者市场的监管越广泛,腐败和寻租的范围就越大。其次,并非所有的个人都有“相同的政治关系,进入官僚机构的机会”。最后是对公平的关注。在模型中,个人收入来源于标准的生产活动和非市场的寻租活动。生产活动产生的不平等被认为是公平的,寻租活动产生的不平等是不公正的。这些针对不平等和不公正的见解让

人耳目一新。

小政府无力纠正市场不平等和不公正问题,大政府又增加腐败和寻租,这带来了政策上的困境。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对穷人的公共开支定位往往是错误的,并且产生腐败和任人唯亲;通常某些游说集团成为最后的大赢家,损害了真正需要的人的利益。然而,即使是有善意的政策制定者,也会抵制削减以上这些措施和项目的要求,因为他们认为腐败的成本是值得付出的,这往往是唯一的方法,至少部分地改善了穷人的条件。阿莱西纳和安杰利托斯(2005a)指出,政策困境的结果导致一个恶性循环——高度的政府干预,市场效率低下,腐败长期存在。如果未能消除这些外部性问题,可能会损害善意政策的长期效果。

对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决定因素的认识及对社会竞争公平性的不同认识,将影响一个社会再分配政策的选择。阿莱西纳和安杰利托斯在《公平与分配》(Alesina & Angeletos, 2005b)一文中指出,收入均等的构成通常取决于税收政策的社会信仰和福利政策之间如何相互作用,且这种构成会存在多个均衡或多个稳定状态。比如一个社会相信个人的努力决定收入,而且所有人都有权利享受他们努力的成果,这个社会会选择低收入再分配和低税率政策。在均衡的情况下,“努力将是高的”,运气的作用将是有限的,市场的结果将是“相对公平和社会信仰将自我实现”。如果相反,一个社会相信运气、出生、关系或腐败决定财富,这个社会将征收高额税款,从而扭曲分配并使这些信仰不断持续。阿莱西纳等在《再分配偏好》(Alesina et al, 2009)一文中指出,通常年龄、性别、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等个人特征决定了再分配的偏好,这也是一个创造历史、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和感知公平的过程。他们采用综合社会调查方法,利用世界价值调查数据对大量国家的再分配偏好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女性、年轻人和美国黑人有着强烈的再分配愿望。一部分人认为人们总是在利用他们,而不是公平地对待他们,从而有着强烈的再分配诉求;相信运气比努力更容易导致成功的人对再分配也有着强烈的愿望。再分配偏好在不同的国家有明显的不同,这是由不同国家的宗教、宏观经济的历史波动和文化的不同而带来的。这将有助于解释普遍存在的收入不平等和再分配政策选择的扭曲现象。

关于公平的信仰影响再分配政策的选择,阿莱西纳等在《意识形态、公平和再分配的演变》(Alesina et

al, 2012)一文中认为,关于什么是“公平”,什么是可接受程度的不平等问题的看法,是超越个人收入的高低的。不平等或多或少是基于财富是如何积累的不同信念,或者凭借努力和能力,或者凭借运气、关系或腐败。一句话,大量的实证经验证明,不平等都是在于对不同水平的收入是公平还是不公平的个人理解。不同经济的动态演化过程由再分配政策、经济增长状态以及人们的公平感共同决定。基于此构建的政治经济模型,可以追溯到过去的政策演变(收入所得税、财产税和转移支付计划),不公平的演变和再分配的偏好,是个人认为公平与不公平的财富差异的可变函数。同时,一代代的选民与遗产相联结,因此过去的再分配政策,过去关于什么是“公平”的不平等的认识成为今天的初始条件,也因而成为现在选民的偏好。这些独到的见解,使得人们对不平等和不公正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如何解决以上问题,阿莱西纳等(Alesina et al, 2012)指出,遗赠税能成为重新分配财富以纠正过去积累的不公平的一个有效途径。不同形式的税,所得税和遗产税,对公平感知是相互作用的。在一定条件下,高的遗产税比所得税更能减少“不公平”的不平等的程度。这一结果与出生时机会均等问题密切相关。他们使用概率投票模型而不是中位数选民模型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其主要原因包括:首先,这使得他们对各种类型的再分配方案的分析更加灵活。其次,出生机会公平是很重要的,被放在讨论公平问题的中心。最后,模型的动态规范可以解决“偏好”和其他参数对模型的冲击问题,这与阿莱西纳和安杰利托斯(Alesina & Angeletos, 2005b)的静态模型正好相反,使他们能够对意识形态与税收政策的内生演化做出清晰的陈述。

#### 四、家庭关系、文化与制度的相互关系 对政治经济的影响研究

家庭是经济的基本单位,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也是制度构建的基础。阿莱西纳和朱利亚诺(Alesina & Giuliano, 2007)深入研究了家庭力量是否会对个体的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会产生直接的影响。研究发现,通常家庭关系强的社会,家庭成员会更多地依赖于家庭生产而更少参与市场活动;在市场活动中,强家庭关系的参与度较低,但家庭产出更高,即家庭关系的力量对经济产出具有明显的影响;具有强家庭关系文化的社会往往会更幸福。但同时也指出当家族有着很强的联系,信任家族成员多,信任其他的

家族则较少,这种家庭关系文化增加了社会成本,不利于社会信誉制度的建立,最终影响到经济效率。同时,他们指出,家庭关系的力量与政治参与有负相关性:越多的人依赖于家庭作为服务、保险、转移资源的提供者,公民市场参与和政治参与就越低。这种建立在微观的家庭力量基础上的家庭文化对经济结果和政治参与的影响研究,激发了阿莱西纳进一步地思考:文化对制度是否会产生影响?如何产生影响?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

尽管有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家庭对经济决策和政治参与有影响,那么在家庭关系强的国家是否比强调个人主义的社会更容易带来不同的经济结果呢?阿莱西纳和朱利亚诺(Alesina & Giuliano, 2007)指出,家庭关系结构影响个人的经济行为和政治态度。家庭关系是孩子从他们的父母获得家庭的作用、爱和尊重的个人反应,这些反应数据从“世界价值调查”对70多个国家的调查而得。他们通过观察美国第二代移民的行为,利用跨国回归分析来评估因果关系。一般的假设是,具有强大的家庭关系的社会对于收入和保障更多依赖于家庭,而不是市场和政府。这个基本思想有多种含义:一是家庭纽带关系是强大的,更多地依赖于家庭生产和更少参与市场活动。二是强大的家庭关系意味着一个更严格的分工,男性更多地参与社会劳动,女性更多地进行家务劳动。三是强大的家庭纽带(Alesina & Giuliano, 2014)为家庭成员提供保险,只有家庭生活彼此密切时才能够发挥作用,因此地理流动性就相对较低。家庭越大(更高的生育率和更大的家庭规模)家庭关系越强大。强的家庭关系在经济上并不意味着是“坏”事。在市场活动中,强家庭关系的参与度较低,但家庭产出更高,即家庭关系的力量对经济产出具有明显的影响。在积极的方面,有着强家庭纽带关系的人们似乎更幸福、更满足于他们的生活。同时,具有强家庭关系的个人不太愿意从事政治活动,一般对公共政策不太感兴趣。强的家庭关系的一个极端是“不道德的家族主义”,也是不发达的主要决定因素。

家庭作为社会经济单位,其组织的性质在不同民族之间有着较大的差异。在一些文化背景中,家庭关系很弱,成员只会感到有义务与其他家庭成员联系在一起。在其他文化中,家庭关系很强。这种家庭通常有较高的生育能力以及妇女承担更多的家庭工作。当家族有着很强的联系时,信任家族成员则更多,但信任其他的家族则较少。阿莱西纳和朱利亚诺(Alesina & Giuliano, 2009)利用世界价值调

查数据,通过观察32个不同目的地国第二代移民的政治参与行为指出,越是一个能相互信任的家庭成员,他们对社会的普遍信任会越低。换句话说,强大的家族关系会导致社会资本的减少;家庭关系的力量与政治参与有负相关性:越多的人依赖于家庭作为服务、保险、转移资源的提供者,公民参与和政治参与就越低。这种缺乏政治参与和普遍的信任是从父母传递给儿童的:(1)一旦获得,政治态度就特别稳定,往往保持相当长的时间;(2)对政治不满的态度不随特定政党或候选人的变化而不同。在社会上,信任是建立在家庭之上的,如果这些对政治的负面态度是由一代传给下一代的,现代民主将面临重大的挑战。正如上面所讨论的家庭纽带关系的力量,不道德的家族主义是强大的家庭纽带关系的一个极端,这种极端是他们“唯一”重要的社会关系。在北欧文化中,家庭关系相对较弱,因此社会资本、信任和政治参与度较高,这与欧洲南部文化正好相反。

文化能够影响经济结果。目前已有文献的研究重点关注的是连接文化和各种经济结果的机制是什么?文化与制度和人力资本等其他因素之间是什么关系?等等。研究结果指出,文化的特质主要包括普遍的信任,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家庭关系,广义道德和狭义道德(其中广义道德下,合作行为扩展到社会的每个人,而狭义道德下,合作行为只在家庭直系亲属内产生),对工作的态度和贫困的认知,宗教、文化对移民的影响等方面。个人对信任的认识首先是通过文化传播,然后通过经验慢慢更新,并一代代传下去。子女从父母处获得对信任的认识,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并不断将经验传给子女。例如,在一个不讲信誉的社会,就会出现“没有信任、没有交易”的均衡状态,不信任的信仰会从上一代传给下一代,并且尽量避免交易。而在一个讲信誉的社会背景下,就会出现“高度信任,频繁交易”(high-trust-high-trade)的均衡状态,父辈会传递真实的信任给子女,这将有利于鼓励交易并学习信任,促进形成有信誉的社会。有信誉的社会和不讲信誉的社会会对经济效率产生直接的不同影响。

对在家庭力量基础上形成的家庭文化及其对社会信誉制度构建产生的影响研究,给阿莱西纳带来了重要的启示和思考:文化与制度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阿莱西纳和朱利亚诺在《文化与制度》(Alesina & Giuliano, 2015)一文中对此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思考。文化与制度能够影响许多经济选择,甚至影响到国家财富增长和发展的速度。目前

文化与制度的关系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从文化到制度,如文化和金融制度,文化、政治和政治制度,宗教价值和制度等。二是从制度到文化,如外生制度变化和冲击,实验观察(通过观察个体在不同的制度下的行为来识别文化的作用),监管制度和制度等。三是文化和制度的相互作用,具体体现在管制和文化,公平价值文化与再分配,个人主义和制度,合作与制度,文化、制度和经济成果等方面。他们指出文化和制度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以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方式发展。同一种制度在不同的文化中运行的效果是不同的,但在不同类型的制度环境下文化却能在不同的方面得到发展。这里需要明确两个任务:(1)明确文化和制度之间交互关系的运行机制。不同类型的制度(如政治和法律制度、监管和福利水平)和不同的文化特征(包括信任、家庭关系、个人主义和普遍道德)之间是反馈交互作用的关系。文化和制度之间的交互关系非常复杂并呈现高度的非线性关系,仅仅从某一个方面去探讨文化与制度的关系很难有解释力。因此在研究方法的采用上,线性回归分析已不适合,应采用数据的结构分析。(2)明确文化和制度之间交互因果关系的通道。仅仅通过使用工具变量或通过查看历史外生变量冲击来试图孤立地证明某一个方面因果关系的研究视角存在着缺陷。由于文化和制度之间的相互反馈交互性,我们不太容易看清楚二者之间的因果联系,所以需要更多的工作来充分理解文化和制度的互补性以及他们如何相互影响和发展。为此需要找到文化变迁和制度变迁的路径,研究它们之间的反馈交互关系,然后才能充分地说明问题。阿莱西纳的这些洞见极大地开阔了文化与制度关系领域的研究视野。

## 五、简评

阿莱西纳的成果可谓丰富和卓越。作为政治宏观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他的研究涉及政治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很多领域:(1)在两党轮流执政体制下,政党间的博弈会导致具有不同政治目标和偏好的决策者们选择不同的财政、货币、通胀等宏观经济政策,形成政治经济周期,反映出政治体制和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密切关系;政治竞争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通常被认为是经济波动的根源,国家相对稳定,政治势力极化越小,经济结果表现得越好,政治稳定决定了经济稳定,对经济政策的积极认识不能也不应忽视政治舞台。这些重要的研究结论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2)种族多样性对经济绩效和政策



选择的影响研究可谓独树一帜,对腐败、不公平和不公正等问题的研究角度让人耳目一新,开拓了新的认识和研究空间。(3)家庭力量和文化对个人经济和政治行为产生影响并最终影响经济产出和政治参与,影响到制度的形成和建立,如社会信誉制度的建立等。文化与制度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是这种因果关系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应从文化和制度的历史发展路径中审视文化与制度之间相互作用关系,才能使我们更清晰地洞见二者间关系的观点,为我们提供广泛认识和进一步研究的崭新领域。

通过对阿莱西纳研究领域及成果的分类梳理发现,他对经济学研究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构建理论模型,如政党博弈模型、政治经济周期的理性模型、理性党派模型、差异性偏好模型等,这些模型通过新变量的引入,为理论创新增加了维度,提高了理论的解释力度,富有独特的见解。二是建立在经济计量实证分析和统计的基础之上。他尽量采用大样本说话,通过实证分析和比较,寻找影响政治和经济的多元变量。他对传统的理论分析给予了清晰的梳理、批判和超越,并且很有说服力和针对性。他丰富的研究成果为经济学的研究开辟了更多新的视野和道路。

#### 参考文献:

- Alesina, A. (1987), "Macroeconomic policy in a two-party system as a repeated gam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2(3):651—678.
- Alesina, A. (1988a), "Credibility and policy convergence in a two-party system with rational vote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8(4):796—806.
- Alesina, A. (1988b), *Macroeconomics and Politics*,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3, MIT Press.
- Alesina, A. & J. Sachs (1988),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business cycle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8—1984",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20(1):63—82.
- Alesina, A. (1989), "Politics and business cycles in industrial democracies", *Economic Policy* 4(8):55—98.
- Alesina, A. & G. Tabellini (1990), "A positive theory of fiscal deficits and government debt",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57(9):403—414.
- Alesina, A. & N. Roubini (1992), "Political cycles in OECD economie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59(7):663—688.
- Alesina, A., G. Cohen & N. Roubini (1992), "Macroeconomic policy and elections in OECD democracies", *Economics and Politics* 4(1):1—30.
- Alesina, A., D. G. Cohen & N. Roubini (1993), "Electoral business cycle in industrial democrac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1(9):1—23.
- Alesina, A., R. Baqir & W. Easterly (1999), "Public goods and ethnic divis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4(4):1243—1284.
- Alesina, A. & E. Spolaore (2003), *The Size of Nations*, MIT Press.
- Alesina, A., A. Devleeschauwer, W. Easterly, W. Kasterly, S. Kurlat & R. Wacziarg (2003), "Fractiona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07(8):155—194.
- Alesina, A. & E. L. Glaeser (2004), *Fighting Poverty in the US and Europe: A World of Differenc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lesina, A., R. D. Tella & R. MacCulloch (2004), "Inequality and happiness: Are Europeans and Americans different?",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8(7):2009—2042.
- Alesina, A. & G. M. Angeletos (2005a), "Corruption, inequality, and fairnes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2(3):1227—1244.
- Alesina, A. & G. M. Angeletos (2005b), "Fairness and redistribu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4):960—980.
- Alesina, A. & E. L. Ferrara (2005), "Ethnic diversit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3(9):762—800.
- Alesina, A. & P. Giuliano (2007), "The power of the family", NBER Working Paper No. 13051.
- Alesina, A. & G. Tabellini (2008), "Why is fiscal policy often procyclic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6(5):1006—1036.
- Alesina, A. & E. Zhuravskaya (2008), "Segreg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in a cross-section of countries", Centre for Economic and Financial Research at New Economic School Working Paper No. 120.
- Alesina, A. & P. Giuliano (2009), "Family tie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repared for the JEEA Lectur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Meeting.
- Alesina, A., P. Giuliano, A. Bisin & J. Benhabib (2011), "Preferences for redistribution", in: J. Benhabib et al (eds), *Handbook of Social Economics*, pp. 93—131, Amsterdam: Elsevier.
- Alesina, A., G. Cozzi & N. Mantovan (2012), "The evolution of ideology, fairness and redistribution", *Economic Journal* 122(565):1244—1261.
- Alesina, A. & P. Giuliano (2014), "Family tie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8966.
- Alesina, A. & P. Giuliano (2015),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53(4):898—944.

(责任编辑:李仁贵)